

從國際發現中國歷史

● 羅志田

大約十年前，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提出，「民國時代的中國歷史是由其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和塑造的，且最終必須由此來解釋」。他認為，柯文所說的「在中國發現歷史」那種側重於內部研究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於民國時代，因為「這一時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國際的層面」。徐國琦教授的新著《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多少便受到此說的影響。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大約十年前，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提出，「民國時代的中國歷史是由其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和塑造的，且最終必須由此來解釋」。他認為，柯文 (Paul A. Cohen) 所說的「在中國發現歷史」

那種側重於內部研究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於民國時代，因為「這一時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國際的層面」。一言以蔽之，在民國時代，對外關係可謂無所不入，徹底穿透於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China Quarterly*, no. 150 [June 1997]: 433. 本文有中譯本，即柯偉林：〈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2月號)。無論怎樣寬泛地界定「對外關係」，它都不能不側重政治面相。在「新文化史」風行的時代，這樣的見解不一定有很大影響。但後來北京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柏林自由大學已就此為主題召開過三次國際研討會，今年還會有第四次。徐國琦教授的新著《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China and the Great War*)，多少便受到此說的影響 (本書是據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而柯偉林就是論文指導委員會的成員)。

該書使用了各國多種檔案，既論證中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貢

獻，也探討這次大戰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本書副標題揭示出的主題是：中國的二十世紀是一個「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時段，亦即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有意識地主動參與國際體系，以成為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的歷史進程。由此看去，一戰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這次大戰不僅標誌着舊世界體系的崩潰，同時也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平台。

對中國如此重要的世界大戰，過去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與本書取向稍類的，是張永進此前闡述中國在1918-1920年間自覺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努力(參見Yongjin Zhang,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1])，但那更多側重戰後階段。徐教授以為，這一時期中國的內政、外交密不可分，最適宜運用他的老師入江昭倡導的「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研究取向來處理，即超越傳統外交史特別側重政府間談判往來文電的方法，以整個國際體系為背景，注重考察國家之間政治和文化等多層面的互動。

除序論和結論外，全書分三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共兩章是背景的重建，主要考察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到一戰爆發這二十年間中國在社會、政治、文化、觀念等多方面的巨變，特別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和作者所謂「外交政策群體」(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國際化的民族主義(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而所謂「外

交政策群體」，是指一個特殊群體，包括像梁啟超、顧維鈞這樣的知識、外交精英，以及一些工商人士和大量有閱讀能力的知識份子。他們的理念支柱是幫助中國的國際化，故對國際事務及中國外交特別關注，成為一戰期間影響中國外交的重要力量。

第二部分共三章是本書的重點，討論中國如何參戰，篇幅佔全書的五分之二強。歐戰意味着舊世界秩序的崩潰，為中國國際化提供了外在條件，而中國的介入也表現出有意參與新國際體系的創建，可謂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的里程碑。另外，歐洲列強的無暇他顧也為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提供了機會，1915年的「二十一條」即為明證。中國的「外交政策群體」認識到了歐戰帶來的機遇和威脅，他們主張對德宣戰，通過參戰立功而在戰後和會上佔一席之地，阻遏日本的侵略企圖，實現中國平等加入國際社會的長遠目標。但中國直接參戰的嘗試沒有得到主要列強的支持，僅法國相對熱心，而日本則竭力反對，最終未能實現。不過，梁士詒提出的「以工代兵」計劃富有創見，得以實施，總共派出的十四萬華工也成為連接東西文明的橋樑。

第三部分共兩章討論大戰對中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包括長期為眾所矚目的巴黎和會與中國的關聯。中國藉宣戰而廢除了中國同德、奧兩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款，並最終躋身戰後的巴黎和會，參與了國際新秩序的建設。中國代表在和會上表現不俗，給國際社會留下深刻印象。這

一戰這場對中國如此重要的世界大戰，過去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徐教授以為，這一時期中國的內政、外交密不可分，最適宜運用入江昭倡導的「國際史」研究取向來處理，即超越傳統外交史特別側重政府間談判往來文電的方法，以整個國際體系為背景，注重考察國家之間政治和文化等多層面的互動。

徐著把中國對一戰的反應看作是走向國際化之漫長道路的開端，但其實柯偉林所說「外國」無處不在的情形或早於民國就出現，徐教授自己就認為甲午戰爭是大量中國人開始思考中國國家認同及其國際地位的轉折點。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參與意識是否有那麼強烈，恐怕還可以斟酌。今日表述為「世界大戰」的戰事，在當年基本上是以「歐戰」出之，顯然更多視為「他人之事」。

些都是那時中國外交成功的例證，也反映出中國人尋求國際化的決心。雖然中國的具體要求未能在和會實現，似乎也不能全以成敗論英雄。而中國對一戰的政策，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內政及社會。

整體而言，在一個急劇變動的世界，面對內部新舊混雜的局勢，中國的戰時外交及國際化努力是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因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而具有世界意義。用作者的話說，大戰把中國變成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

作者明言他試圖「恢復」中國與那次世界大戰關係的「真實記憶」，其實也就是要修改我們對這一時代的歷史記憶，這個嘗試至少部分是成功的；雖然他對史事的劃分和界定都還顯得太過清晰而太條理化，如對「外交政策群體」的界定把支持參戰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實際排斥了社會構成相近而反對參戰的同類群體；又如他為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國際化而淡化甚至否認其排他性，或都還可以進一步檢討。

徐教授把中國對一戰的反應看作是走向國際化之漫長道路的開端，甚至認為「中國的二十世紀」是從一戰開始的。其實前引柯偉林所說「外國」無處不在的情形或早於民國的出現，徐教授自己就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是大量中國人開始思考中國國家認同及其國際地位的轉折點。的確，至遲在甲午後，中國「所有大事」都可見外國影響的局面大致已形成。若以作者所謂「國際化」指代「二十世紀」，自從甲午後那罕見的舉國「師敵」舉動開始，一

個相當不同的中國已經出現，「中國的二十世紀」恐怕已經提前開始了。

至於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參與意識是否有那麼強烈，恐怕還可以斟酌。中國朝野對於是否「參戰」曾有很大爭議，那固然受國內政爭的影響，但也表現出一種相對隔膜的心態；今日表述為「世界大戰」的這一戰事，在當年基本上是以「歐戰」出之，顯然更多視為「他人之事」。要到戰爭結束期間，一些人才開始用「世界大戰」來取代「歐戰」。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要忘了很多中國人在很長的時間裏是把「世界」理解為「非中國」的，它在很多時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詞，至少也是以西方為核心的「非中國」區域。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說，參戰特別是分享「戰勝」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就心態而言，中國與「國際化」最接近的可能就是這一時段，尤其是戰勝之後充滿希望和憧憬的那幾個月，連康有為都以為世界「大同」即將實現！（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但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的「背叛」仍具有極大的轉折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隱喻着「國際」對中國的拒絕。巴黎和會的結果明確告訴中國人：「世界」的確是一個外在的區域；在中國以外的「世界」，特別是與西方關聯密切的部分，公理戰勝大體還有明顯的體現；而中國仍是國際政治中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所說的「世界政治中遠東的隔絕」(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88)。

對中國人而言，此後的「國際」已面目大異，不同的人看見的和迎拒的「國際」可能很不一樣。

後來「反帝」愈來愈成為中國權勢競爭中「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也是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這當然也可視為「國際化」的一種表現，但或不是徐教授所陳述的那種積極主動的參與。最重要的是，如果多少存在着正義和公理的那個「世界」不包括中國，中國或不能不尋求接近甚或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且可能是一個否定當時「世界」的新世界。

當風光一時的杜威 (John Dewey) 於1919年6月來到北京，因學生運動仍在進行而不免感到寂寞時，這位躊躇滿志的哲學家面對一群「無需教誨」的學生 (杜威語)，真

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或許深切地感受到了「威爾遜背叛」帶來的顛覆性轉折——無論就revolution的本義還是引申義來說，這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自然包括破壞，但其解放出的活力，也遠超出製造者和參與者之始所想見 (這是杜威稍後對蘇俄革命感想，參見John Dewey, “Leningrad Gives the Clue”,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 3 [1927-28],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4)。以「資本主義的」或「民主自由的」西方為中心的「國際」對中國的拒絕，為那個杜威眼中半西方半東方的「新俄」在中國讀書人心中的崛起，起到了未必寫實卻能寫意的烘雲托月之功；初或朦朧，後來回味，實在意味深長。

威爾遜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隱喻着「國際」對中國的拒絕。巴黎和會的結果明確告訴中國人：「世界」的確是一個外在的區域；而中國仍是國際政治中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所說的「世界政治中遠東的隔絕」。後來「反帝」愈來愈成為中國權勢競爭中「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但這種「國際化」或不是徐教授所陳述的那種積極主動的參與。

技巧性使然，抑或階級性使然？

● 李 翔



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日本敬愛大學國際學部家近亮子女士長期從事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工作，《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是她的重要研究專著，在研究視角、方法等面向上均富有新意，對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啟迪功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其列入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文庫，2005年1月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